

云南省四县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案例比较研究(续)

钱民辉

四、思茅市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 地理位置与气候

思茅市位于云南省南部,地处东经 $100^{\circ}19'$ 至 $101^{\circ}27'$,北纬 $22^{\circ}27'$ 至 $23^{\circ}06'$ 之间。境东隔曼老江与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相邻,南面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西南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北邻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西北以小黑山为界与景谷县接壤。全市面积386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隆起,境内山脉呈西北往东南走向,山地占面积的98.34%,平坝占1.66%。市境内东北部是坝区(小平原),坝区中间是思茅县城,也是思茅地委、行署和市(县级市)委、市政府所在地。

思茅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低纬高原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北跨度小,气候主要随地形变化而变化。最冷月为1月,平均气温 11.4°C ,最热月为6月,平均气温 21.7°C ,年平均气温 17.6°C ,无霜期318天,年平均降雨量1514.6毫米,日照时数年均1030.5小时,年积温 6302°C ,冬半年地面常向风以西风为主,夏半年以南风为主,平均风速较低。

2. 人口与资源

1993年,全市有户口的常住人口149717人,实际常住人口超过15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39人。全市行政上划分为7个乡,1个镇,49个村公所,3个村级办事处,共546个自然村。居民中,汉族人口最多占73.4%,除汉族外,还有彝族、哈尼族、傣族等20多个民族。

全市有耕地21.74万亩,占总面积的3.74%,其中水田4.58万亩,雷响田2.14万亩,旱地15.02万亩。园地7.99万亩,占总面积的1.2%,包括菜园、果园、紫胶园、茶园、橡胶园、咖啡、砂仁、甘蔗等。林地351.89万亩,占总面积的60.68%,其中森林266.35万亩,疏林41.48万亩,灌木林43.79万亩,覆盖率为45.2%。宜牧荒地64.5万亩,占11.12%,还有93.8万亩疏林草丛、灌木草丛宜于放牧。此外,全市有荒山荒地119.39万亩,占总面积的20.8%,水域4.15万亩,占0.72%,地物10.1万亩,占1.74%。

市辖区有大小河流135条,水能可开发利用蕴藏量500万千瓦,但尚未开发。林业资源丰富,木材积蓄量大,不同树种随海拔不同呈垂直分布,800米以下为北热带季雨林,800—1000米为南亚热带季雨林,1100—1800米为常绿阔叶林,1800米以上的石灰岩山地植被。境内有多种珍贵树种,还有药材、油料、菌类、花卉等植物。本市境内还有各类动物资源,包括野象、虎等稀有物种。

本市矿产资源有铜、锰、银、铁、铅、锌、盐矿等,但大多没有开发开采。本市的主要自然灾害为地震、洪灾,也有风灾和旱灾。

3. 行政建制

思茅市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之前,但当时只有归属而无建制名称。南宋嘉定元年(1735年)始见“思摩部”名称,元、明相袭,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思茅通判”,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思茅厅,隶属普洱府。民国2年,思茅厅改为思茅县,定为普洱道置驻地,后由于疟疾流行,道置迁离。1949年2月,思茅解放,1950年正式建立思茅县人民政府,1958年思茅合并于普洱县,1981年5月,恢复县制(1982年正式办公),1993年3月设“市”(县级

市),为思茅地区行署所在地。市下辖 镇 7乡。

本市地名大多由少数民族语音演化而来。“思茅”源于古代民族部落名,其他地名多出自傣语、彝语、汉傣混合语等。

4. 经济发展状况

思茅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云南省各县中居中游。1993年,思茅国民生产总值 30712万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118元,国内生产总值 30712万元。其中第一产业 6769万元,第二产业 9592万元,第三产业 14351万元,社会总产值 61390万元,国民收入 25634万元,人均 1768元。工业总产值 15102万元,农业总产值 12255万元,地方财政收入 3851万元,财政支出 4919万元,国家补贴 1290万元。根据云南省有关部门统计评估,思茅市工农业生产接近全省中游水平,商品零售和财政收入处于上游水平,第三产业比重较大,非农人口较多(35%左右),据当地人称“显示出城市经济的特征”。

近年来,在 13个“市”级城市中,思茅市的社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排在第 11位,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排在第 1位,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排在第 11位,人均财政收入排第 7位,农民人均交粮排第 5-6位,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居第 3位,非农业人口比例居第 1位,总人口密度则居 12(位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较高,投入也较高,而农业投入则偏低。在各行业中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劳动生产率最高,其次是运输、邮电和建筑业,农业最低。从效益来看,平均成本总产值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工业、运输、邮电和商业则高于省平均水平(重工业和商业附加值最高),轻工业效益低于全省水平(这与一般情况相左)。此外,商业、农业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物耗产值率高,其中商业最高,建筑和农业最低。

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思茅既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也不属于特别贫困落后的地区。这里没有特殊的或天然的优势(如西双版纳的旅游资源、红河的边境贸易、曲靖的烟草加工业),也不能像一些特困地区那样享受特殊扶持款项或优惠政策,因此只能维持一种比较平稳的发展,大部分工业企业效益不好,缺少自我发展能力,但又不至于破产倒闭,仅够维持自身存在,没有大型合资企业或外来投资;农业生产效益较低,粮食不能自给;煤炭、电力等能源靠外部调入,交通运输距离远,成本高。相应地,经济体制没有受到剧烈的冲击和变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各种经济秩序保存比较完整,农村基层组织相对比较健全,经济活动主要还在旧体制框架内进行,但由于现代传媒的发达,人们的商品意识、市场观念及生活方式正处于缓慢转变之中。

(二) 职业教育发展与局限

1. 职业教育发展

建国以后,市政府特别注重农业技术教育、农民教育、职工教育和各类实用技术培训。1958年,根据中央有关决定,县下属每个公社都先后兴办一所农业中学。从 1958-1977年,本境内共办过 9所农业中学,招生 500多人。这些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采用半工半读的教学形式,学生毕业后,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学校除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等文化课之外,还开设农业基础知识、养殖等基本知识课。各农业中学都有实验田地,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并养畜养禽,可以自给自足维持办学。1970年后,这些农业中学先后停办。1955年后,县境内先后办起了不同类型的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大多来自本地区,毕业后回原籍工作。当时兴办的有:热带作物学校(省属)、思茅师范学校、思茅卫生学校、思茅财经学校、思茅农业学校、思茅技工学校。

从 50年代起,县政府设专人负责农民教育工作,鉴于当时农民 90%左右为文盲,农民教育的重点放在扫盲工作上。各乡都办起了农民识字班,有的乡还办起了妇女识字学校,1955年,全县办农民夜校 17所,识字班 32个,5725人入学。1957年,农民识字班入学 8200人,脱盲 3000人,1958年入学 4378人,脱盲 4200人。当时县政府大力推行“速成识字法”,还组织学生到公共场所和路边,要求往来行人认字,民众中则出现夫妻识字比赛、子女教父母认字的场面。这种“群众运动”式的扫盲活动,虽然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确实在短时期内普遍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准。

政府机关中,开办了机关职工业余文化学习班,每天晚上学习 2小时,课程有文化课和时事、政策法规等。此外,思茅县委还开办过一所专门培养乡级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农业文化技术学校,共培训 600余人,其中妇女占 40%。学员除学习文化之外,学习各种农业生产科技知识,并参加生产实践活动。这批学员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起了骨干带头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各种职业教育和培训,直至 80年代才恢复。

1988年起开办城区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班,晚上上课,分高、初中班,使用统编的《工农业余中等学校课本》

作教材。198年开始初中文化补习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参考者合格比例不高,在约200人中,各科均合格者仅20多人,单科合格者90多人。以后,补习和考试多次进行,到1985年这项工作结束时,累计文化补习合格者1078人,占应补课人数的82.5%。此后,职工教育工作重点转向岗位职业技术培训,参加培训的人数相当可观,但由于缺少一套检测手段,目前尚无法确定这些培训的实际效果。

农村扫盲工作在1979年后也恢复和发展起来,各区均开办扫盲班,到1985年,根据在本市最大的农业乡(倚象乡)的调查,14—60岁的农民共6162人,高中毕业的353人,初中毕业的1908人,小学毕业和脱盲的2783人,文盲629人,半文盲489人,脱盲率为81.83%,达到了省内规定的“无盲单元”标准,该乡成为本县第一个青壮年无盲乡。此后,经5年的努力,又使得1300人脱盲,到1990年,经省教委检查,思茅县(当时尚未建市)脱盲率为91.4%,成为“青壮年基本无盲合格县”(实际情况如何无法核实)。90年代后,继续举办各种形式的农民文化技术培训班,分不同层次对普通农民、退伍军人、回乡知识青年、重点户和专业户进行培训,内容包括种植、养殖、家用电器等项目,培训近万人次。本市下属的两个乡被省肯定为“星火计划”示范乡,采用电视录像方式,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教育。

1985年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思茅镇中学改办为“思茅县农业中学”,1985年,又更名为“思茅县农业技术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曾办过2年制班和短训班),毕业后自谋职业。该校曾被有关机构“树立为典型”,描绘为完善教育的样板,受到国家、省等各级官员、专家和新闻媒体的重视,并获得多种荣誉称号。

1985年,县人民政府决定在第四中学内同时办职业中学,一校两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同年9月,招收158名初、高中毕业生,分为商业、财会、建筑3个班,学制3年。职业班开设的课程分为基础文化课和专业课两类。学生毕业后自谋职业。1985年,第一批财会、商业两个班100名学生毕业,其中9人考入对口高校,其余全部被各单位录用。

除职业中学之外,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兴办了其他一些教育机构。1982年,思茅电视大学开始招生,到1990年,公开办过物理、中文、档案、国防、财税等16个大专班,还开办过若干中专班。1985年,思茅县教师进修学校开始筹建,1984年正式成立(1985年改为“师训站”),主要培养在职小学教师,承担各种达标、过关考试、合格证考试等培训。还有1979年建立的水电技术培训中心,1985年建立的民族干部学校,1981年建立的粮食干部学校,商业干部学校,供销干部学校,1982年建立的税务干部学校,1985年建立的电化教育中心等。

据政府文件称:“市职业中学,是在国务院作出‘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为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教委把握这个机遇,把四中的高中改为职中的。”思茅现有2所职业高中,职中学生与普中学生人数比例已达1:1,创办于1983年的农业技术学校,在1990年被省有关部门定为“省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目前该校占地65亩,校舍6872平米,有农、牧、渔场地500余亩,开办过农、牧、渔、林、果等18个专业,毕业生1000多人,现有13个教学班,在校生619人。另一所职业中学原来是普通中学,1985年开始在普中内同时办职中,一套管理人员,两块招牌。后来在中央号召发展职业教育及邓小平南巡讲话鼓励下,市教委“把握这个机遇,把四中的高中改为职中”(政府文件语)共开设过财会、商业、音乐等19个专业,毕业生625人,大多数被社会各行录用,其中9人考入对口大专院校。

除两所职业中学外,本市从1990年开始,举办所谓“三加一”班和“六加X”班。前者指在初中三年级加开职业培训课程,使不上高中的学生能学到一些实用知识;后者指为升不上初中的小学毕业生办班,进行职业培训。1992年开始举办“高三分流”班,让那些已经上了高中、但会考不过关的学生改学一种实用技术,这样就使他们从“高考”这条狭窄的“河道”中“分流”出来。1995年共有“三加一班”11个,430人,“六加X班”1个,55人,“高三分流班”2个,71人。

职业教育的发展除了国家必要的经费外,还有各种附加费和管理费等,职业教育本身也创建了必要的投融资渠道,如某些校办产业的成功发展不仅为本学校提供实习基地,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据教委文件,从事校办产业的学校占总数的83%。目前,全市共有“学农基地”202亩,校办厂7个,“生均收入”(总收入除以学生人数)20元左右;其中农林技术学校的香蕉、甘蔗基地年创利润10万元以上,成为引人注目的“示范基地”,农村小学也发展学农基地,其中最成功的是龙潭小学柑橘基地,年收入4万元。校办企业有胶合板厂、工艺美术装璜厂、服装加工厂、圆钉厂、琉璃瓦厂等,经济效益尚好,此外还有职业中学办的沙石场和旅游餐厅。

2. 职业教育发展的局限

(1) 地区经济对教育持续增长投入的限制

其一,地方财政一直对教育保持积极的支持,教育支出一直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平均占20%以上,在市下属各乡则占到50%以上。1993年,有三个依靠上级财政补贴的乡,教育支出超过本乡财政收入,同时,教育经费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1992年,各乡高出比例均在49%以上。尽管如此,由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地方财政总量有限,不能经常性地支持较大的教育项目,比如“普六”、“普九”投资就造成240万元的缺口,而倚象乡中学的建设只能依靠上级专项拨款(海外华人捐款),职业教育只能靠自己发展。

其二,企业总体效益差,体制上没有独立性,缺少对教育进行支持的动机(如通过捐资提高知名度、树立形象等),因此,企业界对职业教育没有决定性的支持作用,仅有少量“联合办学”,即企业给学校少量资金或提供实习场所,学校破格招收一部分企业子弟入学,或针对企业需要培养学生。

其三,一般居民家庭收入基本上能够支持一个子女上学。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全市全部“职工”年人均工资275元;据当地政府的经济社会调查网络提供的数据,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48元,城市居民217元;农民人均消费水平694.32元,非农民2164.44元,平均为1262.4元。根据本地教育部门的估算,一个初中生至少要开支570元,一个小学生至少开支400元(包括伙食),一般农民家庭能够支持一个学生上学,但同时支持两个学生则比较困难。

除上述直接影响之外,经济发展状况还会间接地影响教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本地经济发展居中,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不发达,缺少迅速崛起的产业或经济实体,发展地方经济的努力不会在短期内产生明显效果,因此没有像某些发达地区那样出现“全民经商”、“全民下海”等经济活动的狂热(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经济起步阶段出现这种狂热几乎是必然的),各级政府官员也还没有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工作上,他们还有相当多的精力关注经济活动之外的事物;而上级政府又把教育作为评判一个下级政府或干部工作的标准,所以各级干部才有可能投身于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成为一些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期望中的振兴地方经济的根本途径,但职业教育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并没有达到期望的成效,于是又陷入了困惑之中。

第二,产业结构和工作水准对职业教育具有负面导向作用。思茅市199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71万元,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比为22:31:47,从数字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全省、全国水平。如按经济成份划分,全民所有制成份占主体地位。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重大,轻工业比重小。这种产业特征影响就业方式和标准。本地缺少非国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一般地说,占经济成份大部分的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缺少投资新项目或短期内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现有的职工及离、退休人员较多,在招工、用人方面又有诸多限制,通常不在短期内大量招收新工人(即使某些重工业效益较好,由于产业自身的特点,也难以成批地大量吸收劳动力),而多采用分散的、个别的招工办法。这种招工形式不利于建立严格统一的考核标准,在实践中往往蜕变为一种仰仗个人“关系”的竞争;同时,工业企业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而目前大量分散的所谓“第三产业”服务水准较低,劳动方式简单,对就业者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要求不高,这些状况不能促使人们努力接受职业教育,反而弱化职业教育的动机。本地一些决策者曾把希望寄予发展高水准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并以此为目标办职业教育,但由于对外经济活动稀少,旅游业萧条(西双版纳机场通航,经思茅的旅游者锐减),无法发展高档商业和饮食服务业,职业教育也受到不利影响。

(2) 教育和就业观念

思茅市是思茅地区行署所在地,驻有各级党、政、军机关及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各种机构较多,具有“干部”和“国营职工”身份的人口比例较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不仅决定自己子女的教育取向,而且对整个社会造成一种“示范效应”。首先,这些人属于享受某种待遇的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他们衡量自己子女成就的标准不是按本地的水准,而是按大城市或发达地区的水准,这就往往高于现实条件。他们希望子女上大学,进入大机关或大公司工作,享受各种待遇,至少不低于父母。第二,这些人自身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家庭环境、气氛有利于学习,子女学习成绩较好,有可能达到某些标准。第三,这些人社会关系盘根错节,每个家庭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与某种权力相联系的“关系”,必要时可以动用这些关系为子女升学或就业服务。总的来说,这些人坚持一些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正统观念”:在教育上,追求较高的普通教育,尤其希望上大学;在就业上,追求“国家正

式工作”，最好是“铁饭碗”（干部或国营职工编制）。

思茅市一般民众的教育观念具有一般中等发达地区的共性：以考大学为最高希望，以“识文断字”为最低要求，而最直接的目的是就业。一般来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家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读完小学，基本达到会认字、会作简单的算术的水平，但这种期望仅仅与子女的未来发生联系，对现实没有“硬性”的必要性，所以常常因为某些现实的、具体的原因而打破。在学生中，自信能考上大学的毕竟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业是最紧迫的目标，而这里“就业”又专指找到“正式工作”（国营或集体编制），因此，教育只有和招工、招干相联系才有意义。人们对教育的关注，仅限于教育能否直接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涉及学习内容在就业中是否实用。这种心态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有助于教育的发展，它为决策者提供了最简捷有效的激励手段，如果能把“受教育水平”硬性规定为一种就业资格，就可以促使人们受教育。

近一、两年来，部分民众在经济不景气、招工招干机会很少的客观形势下，开始转向自谋职业或自己创业，他们也逐渐关心教育内容的实用性，但迄今为止，这种趋势还远远不是社会的主流；几乎没有人放弃本来可以上普高的机会而上职业中学，职中招收的总是学习成绩在二、三流的学生。当然，在现有教育内容和教学体制下，学习成绩高低并不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它更主要的是反映一种社会期望，表明人们至今还没有在观念层面上接受职业教育。

（3）职业教育的困惑

从某种意义上讲，思茅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由政府导向发展的。本地大多数人口既无赤贫的推动，也无暴富的吸引，提高自身素质或技能的要求并不强烈。因此，人们——尤其是干部和决策者——的观念和社会期望对教育的影响显得特别大。目前的职业教育主要是在政府的扶持下发展，农业技术学校一直被视为“成功”的职业中学，1987年建校后多次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这种荣誉本身也增加了学校的吸引力，有利于招生。该校主要面向农村，培养各种农业技术人员，满足了旧体制下农村人口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科学种田”的期望，但笔者认为，该校的成功是在旧体制框架内的发展，并不能代表未来的方向。进入90年代，随着本地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晚于发达地区或特贫地区），人们越来越感到依靠农业生产不可能发家致富，多数农村青年改变了思路，认为最佳选择是摆脱农业，直接加入到工、商等非农业产业中去发展自我，因此，招生方面已出现困难，现在开始转向城市所需的专业。

以城市生产方式而兴办的职业教育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思茅四中原来是普通中学，改为职中后，以第三产业为服务方向，所设置的课程也与市场的需求密切结合，但是思茅的整体经济不够发达，“人才需求量不大，一、两个班就饱和，较难办长线专业”（校长语）。现在的想法是“想办法选准专业，或招生扩大到其他县”（校长语）。目前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校长与地区行署的一些干部有较好的个人关系，便于上下疏通“关节”。职中有自己的歌厅、餐厅，地址邻近地区行署，有些官员经常带来访者来此用餐、娱乐或洽谈事务，职中则借此获得他们的支持。

但是市教委则倾向于四中恢复成为普中。市教委的观点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担忧：现在职中有些学生得知某单位需要招人，没等毕业就去那里工作，事实上等于辍学，达不到“普九”要求的学制，但学校方面准许这样做，并设计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以“函授”完成余下的学业。教委和社会各方面有些人认为，所谓“函授”无法真正实行，事实上就是“退学”的代名词，如放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学制的严肃性，导致教育体制的混乱；而职中方面则坚持这样做。据校长说，“有一个酒楼，急需人，（我们）考虑到学生出路，准许她们边工作边学习，（我们）寄材料，老师定期去辅导，期末参加及格考试，对此各方面有看法，认为没有学够学制，我们认为职高应该灵活……”。这场争执提出了当前教育最棘手的问题：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严重冲突，综合目标与实用目标无法调和。既然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实用技术以胜任某项工作（对个人而言就是就业），那么，只要用人单位认为某人可以录用，就表明他（她）已能胜任工作，当然也就毋需为了学习这项技能而错过使用这项技能的工作机会。事实上，不仅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也面临同样的两难悖论。

一般民众出于传统习惯，不自觉地偏爱普通教育。而一些干部和教育界人士则理智地反映出维持普通教育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普通教育培养的人才基本素质好，更善于理解和适应现代社会，在未来，其发展潜力势必大于职业教育培养的工匠式的人才；现在不应该因为一点点小的眼前利益的吸引，就放弃普通教育而热衷于职业教育，这种轻易改变教育方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一旦酿成错误，后果不可挽回。

像其它地区一样,思茅的教育在目标方面存在着“分裂”现象,不同级别、不同利益集团对教育的理解不同,兴办教育的目的也不同。省、地区当局从抽象的“教育促进发展”逻辑出发,号召兴办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目的在于“从根本上”促进地方发展。县以下的基层干部主要基于道义和行政责任,“积极贯彻”上级指示,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力求达到上级希望的指标(如,普高与职教学生人数比例达到1:1),而受教育者(大多来自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家庭)迫于生计,顾不上那么多的“总体”、“长远”目标,只能从自己的“饭碗”上着眼,其思路和结论与官方的期望并不一致。他把工作当作首要目标,专业兴趣随就业环境变化而不断变换。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目标难以协调,职业教育的发展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学校处于各种力量的焦点,无所适从,惨淡经营。

从长远来说,发展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对地方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教育发展取决于行政推动和财政拨款,发展什么要由主管部门“决策”,因此存在着所谓“重点”问题,确定某方面为“重点”,意味着人为地把资源优先分配给这方面(通常称为“倾斜”)。1993年前,思茅县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六”、“普九”上,这项工作明显属于基础性项目,符合上级的“总体目标”,但不会给本地带来“眼前”效益。1994年,“普六”工作已“如期实现”,“普九”工作推迟,县当局开始“联系实际”(实际仍然是贯彻“上级精神”),侧重于发展职业教育。

现在的问题是,在人、财、物有限的情况下,究竟优先发展哪些具体项目,才更符合当前地区发展的需要。在现实中,支持一类项目就可能牺牲另一类。这里还不仅仅是资金多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事物之间的连带关系。比如,目前就难以断定发展职业教育是否会破坏“普六”、“普九”的成果。职高学生提前离校找工作的现象,表明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然而,哪个决策人也无法真正把握社会趋势,因此,职教、普教“谁重谁轻”的争论一直存在。由于争论涉及到两方面教职工的切身利益,使得各种观点真假难辨。

不管人们怎样争论和认为,都应该从体制上(而不是凭干部自身认识)保证职业、普通两种教育同时发展的可能性,特别应该寻找新思路,一种思路是促进教育市场化进程,以社会自发需要为导向,减少“人为”的成份,使职教与普教依市场需要而消长;另一种思路是,设法打破目前职教、普教非此即彼的状态,促成二者结合,双向渗透或实行双证制度也许更适合农村地区人们的观念和劳动形式。

五、安宁县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 地理位置

安宁县位于滇中平原的东部边缘,地处东经 $102^{\circ}08' - 102^{\circ}37'$,北纬 $24^{\circ}31' - 25^{\circ}06'$ 之间,辖区南北长约66.5公里,东西宽约46.6公里。东面和东北面是昆明市的西山区,西面、西北面与禄丰县接壤,西南邻易门县,南面和东南面连接晋宁县。县治连然镇位于县境北部偏东,距昆明市区32公里。云南西部交通主干线昆(明)畹(町)公路由连然镇通过,滇池唯一的出水通道螳螂川也流经此镇。

安宁县总体地势南高北低,处于滇池西岸丘陵、台地、河谷和中低山向高原主体过渡的地带。境内群山环绕,河溪纵横。这里的山脉属于乌蒙山脉,大多呈南北走向,水系分属元江水系和螳螂川水系。全县最高点是西南部县街、八街交界处的黑风洞,海拔2617.7米,最低点是鲁家村河谷,海拔169.8米,相对高差919.7米。与云南其他县相比,地表起伏不大,地貌相对完整。

2 气候与自然资源

安宁县气候属于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温凉气候,年平均气温 14.7°C ,据近20年的记录,最高年平均气温 15.1°C (198年),最低年平均气温 13.8°C (1971年),一年之中最热月为7月,平均气温 21.5°C ,极端高温出现在1977年6月17日,为 33.3°C ,最冷月份为12月,平均气温 4.7°C ,极端低温出现在1974年1月6日,为零下 6.9°C 。

安宁全县总面积为132平方公里,约合196050亩,平均海拔1800米。全县可用于林地的土地面积1446000亩,占总面积的73.7%,其中527370为有林地,森林覆盖率为26.2%,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全县耕地面积144819亩,约占总面积的7.4%,其中水田占56.3%,旱地占43.7%。河谷坝区是全县主要农作物区,全县农业以种植水稻、蚕豆、油菜、小麦、烤烟为主。在丘陵、缓坡和低山地区有部分梯田,种植玉米、洋芋、茶叶、水果等。

安宁县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铁矿蕴藏量估计有2.7亿吨,已有几十年的开采历史,过去一直

由昆明钢铁公司统一负责,近年来出现农民土法上马挖矿。磷矿储量 6 亿吨,现已开采。近年又探明安宁地下的又一个特大型食盐、钙、芒硝矿床,蕴藏丰富,构造简单,便于进行工业开采。另外,安宁还有锡、镉、银等矿产有待开发。

安宁县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宁温泉”,据称有“天下第一汤”之称,明代(公元 1368—1644 年)就已经成为名胜之地。目前安宁的旅游项目主要围绕温泉展开,现已形成众多景点。安宁县人一直认为旅游业是振兴安宁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

3. 人口

安宁县 199 年总人口为 226037 人,其中城镇人口 109648 人,农业人口 116389 人,分别占总人口的 48.5% 和 51.5%。在我国应算是城镇化很高的地区。人口密度为 170/平方公里。在总人口中,男性人口 122123 人,女性人口 103914 人,男女性比例为 1.18:1,高于全国平均值。全年出生人数为 2423 人,出生率为 10.74‰,死亡人口 1172 人,死亡率为 5.19‰,自然增长率为 5.5‰。

安宁县人口中汉族 205004 人,占总人口的 90.7%。除汉族外,还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等。由于非汉族人数较少,民族区别对社会经济各方面影响不大,所以通常人们把安宁视为“汉族县”,但从历史上看,本县境内彝族、白族等人口比例曾相当高,当地许多地名来自彝语,说明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本地有大量彝族人口分布。随着各民族的迁移和交往,本地各民族存在着融合的趋势,各民族的传统、习惯、习俗均有共享现象,民族之间的某些差别,更主要的是由于地域不同所造成,不取决于民族传统文化本身。

4. 经济发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和云南省利用安宁县内的资源优势,先后大规模投资建成几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最主要的是“昆明钢铁公司”。这些大公司、大企业位于安宁境内,为安宁县增添了现代的工业技术、生活方式和巨大的财政收入,但这些大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直属省、市,企业生产生活诸方面完全是自给自足,与地方没有有机的联系。这种地理上的重叠和制度上的壁垒,造成一种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格局,一个县内有两个社会,一个是由现代化大工业组成的、属于上级管理的“昆钢”厂区,另一个是由县政府管辖的安宁县。昆钢厂位于县城南几公里处,有自己的居民区、商业区、街道、医院、学校、娱乐体育设施,像一个完整的小城镇,其繁华程度与县城差不多,有些方面还超过县城。这种“二元结构”带来一些怪现象:比如,就在高炉林立的工厂围墙外,本县农民正在用较落后的劳动工具耕作,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人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的身份、地位、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相去甚远。同时,安宁县领导到钢厂办事十分困难,因为按先行的所谓“行政级别”来衡量,县委、县政府只相当于昆钢一个车间主任的级别。

“二元结构”一直是安宁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一方面,这些大企业的存在,确实提高了安宁县属地方的产值和财政收入,据 1992 年的数字,安宁县与云南 12 个“市”相比,财政收入排名第一,社会总产值排名第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均排名第二,其数值之高,令人注目;同时,昆钢等大企业中大量技术工人、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存在,也提高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县内人口的文化水平。但另一方面,这种高产值、高收入、高水准又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实地考察表明,安宁县并不是一个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地区,根据官方数字,1993 年县境内国民生产总值为 18.5 亿元,增长 19%,但其中县属部分只有 5.4 亿元(农业 1.18 亿元,工业和建筑业 2.29 亿元,第三产业 1.92 亿元),增长 15.5%。全县境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8184 元,但县属部分只有 3622 元,迄今为止,庞大的昆钢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对地方经济没有“必然的”促进作用,而安宁县属地方的经济发展在省内只处于一般水平,属于刚刚步出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进入“起飞”阶段;人口素质方面如果不算昆钢人在内,真正属于本县的人口,文化水平并不明显高于其他县。

(二) 职业教育发展与局限

1. 职业教育发展

安宁县职业教育兴办于 80 年代。1985 年,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安宁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和本县实际,决定大力推动职业教育,以便调节和解决教育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升学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安宁创办高级职业技术学校,1986 年 9 月 10 日,正式成立“云南省安宁县

职业技术学校”,安宁从此开始拥有正规的职业教育。第一批学员 96人,3个专业:工业企业管理、幼儿师范、建筑。198年,又增设 3个专业:电子、财会、民族初级职业教育,共 230名学生。

安宁成人职业教育也是 80年代建立发展起来的。198年,“安宁工农教育委员会”成立,委员由县文教局、县总工会、县经委、县妇联、县团委主要领导组成,具体负责职工教育和扫盲工作,从此,县属各企事业单位及驻安宁的中央、省、市属各企事业单位的文化补习(初中文化)活动逐步开展起来,许多单位办起了脱产、半脱产及业余补习等形式的学习班和业余学校,其中包括:198年成立“夜校补习班”,招收了银行、农业水利、工交、卫生、财税等部门职工参加学习;198年,县政协开办业余补习夜校。1983-1985年,举办 10次初中文化补习及格考试。在职工教育的同时,农村扫盲工作也开展起来,198年,开办扫盲试点班 4个,同年 5月,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扫盲工作的报告》之后,从 1983年至 1986年,举办扫盲班 189个,学员 5786人,脱盲 2838人。到 1986年 10月,全县 16-19岁人口无盲率已达 87.3%,全县无盲率平均在 80%以上。198年,按照国家规定的指标,安宁县实现了“基本无盲”。

198年,“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在安宁招生,1986年,“中国农函’安宁辅导站”成立。

198年,共青团安宁县委开始举办农民技术培训,1986年,成立了农村实用技术领导小组,共办班 15期,学员 778人,县科协办班 28期,学员 8444人,培训项目有裁剪、烤烟、食用菌、农业技术、统计、家电、养殖、会计、建筑、爆破、机绣等。

198年,安宁县教师进修学校开办“汉语言文学专科班”,学员多来自 198年高考落选者,农村学生居多,经考试 19人录取,另收“视听生” 30人。198年 24人取得毕业证。

安宁县职业教育的中心是“安宁职业技术学校”。职校的前身是“农业中学”,1986年,昆明市当局根据“中央精神”,要求下属各县每县一所职业中学,县当局决定以原农业中学为基础,兴办职业中学。至今各方面投资已达 352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本土投资,现已建成主建筑 9幢,包括教学楼、综合楼、实验楼、教工学生宿舍、礼堂、实习厂等,共计 10368平方米,加附属建筑合计 12000平方米。还有目前正在建的一个主建筑和一个实习基地,建成后总投资将达 500多万元。这些投资都是依靠贷款。由于职中本身有收费和创收机制,所以自己要负责偿还部分贷贷。县政府表示,由于 1993-1999年重点支持“普六”、“普九”工作,只能从 1999年开始帮助职中还贷,3年内可代还全部投资的 80%及所有贷款利息,其余由职校自己偿还。由于建筑公司老板是本校毕业生,建筑费优惠(具体比例不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贷款压力。此外,职中自己还投资 4万元,开办小型建材厂、金属实习厂、建筑队(已停业)、小卖部等,目前正在准备投资兴建汽车修配厂。

关于安宁县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参见表 5 除了专门的职业中学外,有一些普通中学也开设了职业班。如表 5中有 4所普通中学共开设了 6个职业教育班。

表 5 1993年安宁县职业教育情况

	学校数(所)	班数(个)	毕业生数(人)	招生数(人)	在校生数(人)	专任教师(人)
安宁职中	2	11	188	299	519	41
安宁二中	1	2	59	60	60	2
LP职中		2	36	68	68	
TP职中		1	33	38	38	
安宁三中		1	34	46	46	
L中		2	80	102	102	
YL中		1	45	45	45	
总计	3	20	475	658	878	43

2. 职业教育发展的局限

(1) 产业的“二元结构”带来的限制

安宁县内的大企业蕴涵着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能够适当扩散,安宁县的教育事业本来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二元结构”从体制上制约着大企业与本站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扩展,大大减弱

了本地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

其一,大企业的“封闭性”和“非扩散性”特征,决定了它们对本地职业教育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大企业自给自足,不能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大企业的职工和家属始终工作、生活在自己的“独立王国”中,招工、招干、职业培训均在自己的体制内完成,人们“从妇产医院到火葬厂”都用不着离开厂区,无需本地人提供任何意义的服务,因此,这些国营大企业的存在,不能增加县属人员兴办服务业的机会,也不能刺激人们对服务技能的兴趣。

大企业没有扩散能力,不能带动、支持本地产业发展,不能造成对熟练工人、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需求。大工业企业在产品类型、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等方面与本地相去甚远,在业务上无法与本地产业衔接,在体制上没有向地方辐射、扩展的机制,不可能在本地投资兴办相关的小型企业,也不会主动开发当地人力资源,推动产业类型转移等等,因此不能促成对产业型人才的需求。

大企业的存在,不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个人前途,反映在教育上,就不能以就业方面的希望来唤起人们受教育的动机,也就不能吸引大多数人主动地接受教育,不能以社会需求来促进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发展(来自需求方面的“拉力”总是比来自政策的“推力”更为强大)。

其二,工业不扩散,延缓了县属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影响了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从经济方面限制了民众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也无法推动本地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云南省县级行政区中,安宁县县属人口的收入是比较高的,根据“云南省县级农村社会 1992年综合实力 20强县”的统计资料,安宁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在第 10位,但如果考虑到安宁县的人均产值和财政收入在全省 13个市级行政区划中名列前茅,那么农民人均收入则显得偏低,与安宁县雄厚的工业实力不相称。近在咫尺的工业中心只是在税收财政等方面“机械地”支持地方发展,而没有促进县属部分内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生产效益的提高。县属城镇的都市化和乡村的产业化程度并不明显高于其他没有大企业的县。然而,由于受社会总体发展的影响和大企业的示范效应,安宁县城乡生产和社会服务方面出现“超前”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生产生活中需要现金支付的项目越来越多;县境内大型企事业的高收入阶层的存在,又提高了生产、生活资料价格的涨幅,相对于总体消费和支出状况而言,农民手中现金收入较少,可转用于教育等“非生产性支出”的资金比例增长缓慢,对于教育的投入则更为谨慎,更注重切实的预期效益,这无疑会抑制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假如这些大型企业在几十年的运行过程中能够带动本地一批乡镇中小企业成长,就可以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现金收入,为受教育提供经济保证。

(2)发展职业教育的局限与困难

职业中学是目前各级政府注重发展的学校,所以在资金等方面往往享受一些优惠,但在实际运作中,职中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主要问题是不包分配导致不好招生。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职中努力争取与大企业“联合办学”,学校请企业负责人在学校兼任各种名誉职务,学校按企业的需要培养学生,毕业后供企业使用,这种做法,等于把学校办成企业的培训部,保证了学生毕业后有较好的就业机会,然而,愿意并且有能力进行这种合作的企业很少。安宁企业数量有限,多数为政府主管的国营或集体企业,经营上并不十分景气,招工和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不大,而现行体制对这类企业的招工、招干还有多种限制,企业无法独立决定。按照职中领导的分析,安宁县的职业教育主要存在着几个难点:

其一,学生就业难。校长认为安宁经济已经发展,但由于社会风气影响,有些干部任人唯亲盲目追求廉价劳动力等因素,职中学生难以找到工作,解决办法是由政府制定政策,要求下属企业招工时将专业证书作为一项条件。“企业无此头脑,政府才有眼光。”只能靠指导性、强制性的方式解决。

其二,学生实习困难,职业培训要求。学生应该掌握实际操作能力,毕业时要成为熟练工,但现在职中达不到这一要求。目前实习课少于 40%,不符合计划,一般企业不愿接受实习生。“领导认为管理方面不好办,其实是思路问题,实习生不仅是负担,也是一种廉价劳动力。”校长认为解决办法“最好还是靠政府协调”。

其三,职业学校是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的教育形式,但在管理上沿袭原有旧体制,有些方面出漏洞,比如职业中学缺少一种检测教学质量的指标体系(普中有升学率等)也就没有互相竞争的压力,教材无法统一,不可比较,没有规范标准。同时,职中与中专有趋同倾向,行政领导往往分不清二者区别,把职中办成中专。

其四,师资问题。普通教育已形成一套培养师资的机制,职业教育没有系统,师范院校不培养职教人才,而

培养现有的教师,又要花费时间和经费。有些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如原某建筑公司副处长),因为没有文凭无法提级,又没有时间和条件进一步上学等等。据校长称,他的学校如果不借地理优势,早就办不下去了。

(3) 普职双向渗透的困惑

从1988年起,一些普通中学开设“3+1”农村职业教育班。“3+1”班是一种正处于实验阶段的新学制,就是让学生在初三毕业之后,再上1年职业培训班,学习一些实用技能,以此来调和普通教育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安宁县从1988年开始在1所学校试行3+1班,其他10所均已失败,只有一所学校坚持至今,原来每年招1班,1993年扩展为2个班,专业包括茶叶果树栽培、食用菌、烤烟、种养、农村财会等。据校长称,这些专业是根据当地实际和有关政策决定的。比如去年县政府派人外出考察,决定投资兴办茶叶基地,这所学校随即决定开办茶叶栽培专业,同时本校也结合专业兴办一些果园、茶园等。

学校所需的各项资金均由国家拨款。1989年乡政府拨款3万元,县政府拨款7万元建实验室,市政府拨款2.5万元购置设备(但这些钱不给学校,而是直接拨给一家专门代买设备公司,由他们代办)1990年县政府拨款2万元搞基建,当时新设3+1班,学生受歧视,为了鼓励大家上这种班,每月给每个学生8元钱,实习时要借用农户田园,每天给0.8元。

这所坚持下来的学校学生不安心学习的现象比较严重,官方报表的学生流失率为7—8%,实际情况可能还高。据校长说,失学学生主要分为3种情况:(1)学生出身于农村,家中生活水平居中,本人学习成绩不好,家长对子女的学习没有督促和要求,学生来校名为读书,实为找同龄人玩,因此来几天就走,经老师劝说又来,过几天又走,这类人约占40%;(2)学生家庭生活困难,无钱无粮,本人学习较好,愿意读书,家长也希望子女能继续读下去,但无力支持,这类人约占5%;(3)学生本人愿意上学,但学习成绩不好,家长认为子女升学无望,不支持其继续上学,也拒绝校方的劝说,这类人占40%,女生居多。

据这些学校的校长说,本乡乡镇企业不发达,没有高科技,不需要较高层次人才,只需初级人材——有一定基础、有技术、有操作能力,特别重要的是“思想上要坚定安心在农村,这种人,社会、家庭都需要”,“这也是职教班家长的一致意见”(校长语)。县城里职业中学的学生绝大多数不愿到乡下做事,因此3+1职教班尤其显得重要,职教班学生回乡能发挥作用,职教班学生多的村子,“多种经营”搞得不好,“学生本人不一定搞得不好,但有带动作用”(校长语)。目前的问题是农业技术班招不来学生,人们不愿从事农业劳动,只愿发展果园茶园栽培等项目。

六、四县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一) 四县的经济特征比较

通过对云南省4个县:彝良、安宁、思茅和金平的分析,根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结合研究的各项指标衡量,安宁和思茅的教育发展速度和水准比较高,而彝良和金平比较低。根据实地考察,4个县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背景均有很大区别。

彝良县位于云、贵、川3省交界处的山区,历史上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本县交通(县内交通,本县与外界的交通)困难,附近没有大城市,没有重要交通枢纽,没有名山大川等现成的旅游资源,至今尚未发现具有大规模开发价值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国家特别投资兴建的工业建设项目,虽然经过多方扶持,但至今仍然是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地区。本地人口包括汉族和苗族,生活水平不高,受教育水平和生产技能偏低,除少数人有条件通过各种途径离开本地之外,其他人普遍存在着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心态,思想观念也比较保守封闭。按中国国内标准,“贫困人口”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这里古代传统教育不发达,现代教育起步也比较晚,文化教育基础薄弱。当前支撑这里教育工作的动力,一方面源于政府系统内部机制的运作产生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基于普通民众子女试图通过升学摆脱贫困状态的梦想。只有这两方面因素同时发生作用时,教育才有可能维持或发展。而直接削弱人们受教育动机的因素,是普遍性的教育与就业需要的脱节。而职业教育能按照经济发展需要去发展,所以它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其他教育。

安宁县靠近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直接处于大城市辐射下,同时,境内有国家重点大型工业基地和全省闻名的旅游胜地,信息交通方便,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比其他3个县要高。但是,本县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

发达地带和偏远地区相对差距很大,同时,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国有大工业基地、旅游部门与当地社区形成制度壁垒,各自形成互不相通的独立的完整的体系,俨然两个世界,当地人称这种情形为“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本身只是影响社会经济潜力的充分释放和发挥,它可能不能很好地促进,但也不直接破坏或阻碍地方发展。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境内的经济发展使得地方财政状况比较好,有足够的实力发展教育事业。

安宁县社会经济环境对教育的消极影响不在于总体社会经济结构,而在于由此造成的社会生活环境。这里的相对“发达”,意味着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化,个人选择的机会增加,传媒把大量超前于本地发展水平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引入本地,对青少年形成强烈的示范作用。许多人因此放弃学业,试图通过其他捷径实现梦想。这种“发达”导致的教育的衰落,在中国许多经济刚刚起步的地区普遍存在。

思茅县相对其他3个县而言,是一个各方面都“一般”的县:经济发展处于中等发展水平上,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劣势,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地方政府机构和行政组织运行比较平稳,但效率不高。然而,就在这种“平淡无奇”的状况下,教育事业却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当然,这里所称的“发展”是指按中国现有衡量指标的“发展”,并不包含对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或教育效果的评价。思茅教育的发展,得益于两个因素:(1)云南省普遍性的“政府主导”的教育发展模式;(2)稳定的(或停滞的)社会状态促使政府系统倾向于并且能够把比较多的精力投放到教育工作中。

金平县是一个位于边境(从人文地理角度也比较偏远)的多民族杂居的县,人口中非汉族人口占多数,具有深厚的地方传统和民族传统。金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薄弱等方面与彝良有相似之处,但其不同点在于,彝良地处南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民族比较多,且地处边境,有机会接触、保持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比较易于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除了贫困地区共有的资金不足、教育与就业需要的脱节(就业素质要求偏低)等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因素之外,金平县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民族文化传统对现代教育的消释作用。在当地,教育事实上在充当“文化熔炉”的作用,它试图把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融化到当前中国式的“现代文化”之中,但相对于当地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言,这个熔炉又明显地“火力不足”。在上述各种条件下,以“正规”的学校教育做为提高人口素质的“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不是一种最佳选择,可能是一个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二)四县职业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

从上述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中可以看到,金平与彝凉是属于经济较贫困的地区,其发展速度也很缓慢,境内工业企业都不发达,这就制约着社会各界对教育经费的支持。同时,个人和企业捐助、赞助的机会极少。从金平的职业教育来看,初期发展很快,但随着很快饱和的就业市场,职业教育发展很快就慢下来,现在基本是一种:经济发展慢职业教育发展慢的特征。从彝凉县来看,其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是我国西南地区经济不发达省份中较突出的特困县,这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从彝良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看,其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发展轨迹,虽一直都是缓慢地发展,但在现在,由于政府支持并参与职业教育的调整,端正办学方向,明确规定职中不参加高考,并每年安排职中毕业生一定的招工招干指标,学校自身不断拓展专业,根据当地经济需求设新专业,并与用人单位合办,如烟草公司投资办烤烟班,与广播电视局合办家电班等。另外注重农业科技培训效果,面向社会办职业技术短训班,并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县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由于职业技术培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从总体看来,构成了当地经济发展慢而职业教育发展快的特征。应当指出的是,职业教育虽然发展快,甚至超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但由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合理,不但没有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负担,而且在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由此看来,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在初期是一种负作用关系不是绝对的,职业教育本身的生命力还在于自身内部结构的合理和不断调适。

思茅和安宁都是云南省经济发展快的地区。思茅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云南省居于中游,近年来,在13个“市”级城市中,思茅市的社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排在第1位,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排在第12位,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排在第1位,人均财政收入排第7位,农民人均交粮排第5-6位,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居第3位……。可以看出思茅经济发展的实力来。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对教育一直是保持积极的投入,但投入的年增长率不高,随着教育的快速发展,由于经济投入不足,滞缓了教育的发展速度。由于当地经济处于发展之中,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不发达,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就业结构限

制,所以职业教育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快速发展,相对来说,当地经济发展快与职业教育发展慢构成了思茅市这两者互动的特征。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对外经济活动稀少,旅游业萧条(西双版纳机场通航,经思茅的旅游者锐减),无法发展高档商业和饮食服务业,职业教育因此受到了不利影响。

从安宁的经济发展来看,它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是很高的。但是却存在当地人所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既是说,一个县内有两个社会:一个是由现代化大工业组成的、属于省管理的“昆钢”工业社会,另一个是县政府管辖的安宁县。这种“二元结构”提高了安宁县属地方的产值和财政收入,据1992年的统计数字,安宁县与云南12个“市”相比,财政收入排名第一,社会总产值排名第三,人均各种产值均名第二。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实际也有个二元的指标,调查中发现,1997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为18.5亿元,增长19%,但其县属部分只有5.4亿元(农业1.18亿元,工业和建筑业2.29亿元,第三产业1.92亿元)增长15.5%。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184元,但县属部分只有3622元。迄今为止,庞大的昆钢还没有对地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这种情况,反映在教育方面也出现了“二元结构”,即企业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县属的教育培训体系。两者相比较而言,企业的职业教育自成体系,供需平衡,发展快;而地方的职业教育由于人力市场口径窄,市场需求难以预测,因此其发展速度不如企业快。但从总的四县比较来看,安宁县的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发展快是四县之首,从另一个方面说,大企业必然带来大的人才需求,这种趋势必然会为安宁县的职业教育发展带来动力。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政编码 100871

〔本文责任编辑 翁燕珩〕

海峡两岸儿童人格教育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刊主编滕星同志应邀参加

1998年3月29日至3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和台湾人格建构工程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儿童人格教育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术会堂召开,来自台湾国立花莲师范学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台北师范学院等方面的代表,以及来自大陆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教科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广西桂林市教委、南京师范大学、海南省教科所、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长兼《民族教育研究》主编滕星同志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大会主题发言。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后现代化社会儿童教育”、“学校情意课程与儿童人格建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人格养成教育”、“教师人格与儿童人格发展”、“中西人格教育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滕星同志就四川凉山彝族儿童教育状况向代表们作了专门介绍,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和关注。

大会将代表们提交的论文汇编成册,分台湾部分和大陆部分。滕星同志与其研究生张俊豪的论文《跨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人格研究》也被收编其中。

(章浩 供稿)